

馮著的突出貢獻在於他用十分經濟的篇幅為我們揭示了以下悖論：一方面，當時的威權政府擁有空前絕後的強大動員能力；另一方面，這種動員能力的實際後果卻是破壞大於建設。

因為莫名其妙的「積肥」運動、因為興建公共食堂、因為「全民煉鋼」興建土高爐、因為興修各種水利工程和各種「形象工程」，而被強行拆毀，造成房主人流離失所，死於非命（頁169-70），而是在於他用十分經濟的篇幅為我們揭示了以下悖論：一方面，當時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集權體制內部到處充斥着混亂與漏洞，無時無刻不在蠶食着集權體制本身。一方面，當時的威權政府擁有空前絕後的強大動員能

力；另一方面，這種動員能力的實際後果卻是破壞大於建設。

筆者希望向學界同仁——尤其是一些「新左派」朋友——推薦馮客的這本新書，因為該書依據大量檔案文獻所提供的確鑿事實和數據，無情批駁了「威權政治可以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計劃經濟可以杜絕無序競爭造成的惡果」等謬論。如果說過去對毛時代的迷戀是源於我們的無知，那麼在知道了歷史真相以後，難道我們不應該從思想上徹底告別那個時代嗎？

## 認同：個體、社會與普世

### ● 呂文江



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著，呂文江、田嵩燕譯：《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1950年代之後，心理史學在美國蓬勃興起，其中執牛耳者是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再傳弟子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1969年，埃里克森發表心理史學專著《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一時好評如潮。該書的中譯本(以下簡稱《甘地的真理》，引用只註頁碼)已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10年5月出版。

《甘地的真理》核心講述的是1918年2至3月間，甘地在印度西北沿海城市阿赫梅達巴領導的一場紡織工人為求加薪而進行的罷工事件。以這一事件為核心，埃里克森回溯甘地的成長過程以及他的真理觀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在對甘地之所以成為甘地的分析中，埃里克森運用了他所創立的「認同說」。鑒於「認同」(identity)現在已是相關學科中一個關鍵概念，而埃里克森不但據說是英語世界中首創「認同」概念的學者(李歐梵：《西潮的彼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83)，而且他的「認同說」內涵豐富，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所以本文結合《甘地的真理》一書中的相關分析和實例，簡要梳理一下他對「認同」的用法。

首先要談的是個體的認同。我們知道，作為「新弗洛伊德主義者」的埃里克森，對弗洛伊德學說在繼承的基礎上有重要發展，主要表現之一即是他以自己創立的人生階段論來突破弗氏精神分析學一味專注童年時期性潛意識的局限。在埃里克森看來，個體心理與人格的發展貫穿人的一生，並可分為嬰兒期、幼兒期、學齡前、學齡期、青春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顯著心理—社會危機需要克服；能夠克服就可獲得心理上的安全

感，不能克服則會導致人的漂泊迷茫(頁16)。

埃里克森指出在青春期之後，認同危機會成為個人面臨的突出問題，但在之前的人生階段就存在有關認同之事。事實上，家庭、家鄉、母語、本地的宗教信仰等既定的因素作為個人自幼就熟悉乃至親切的事項，構成認同的重要來源。甘地出生的家庭屬於吠舍種姓的一支班尼亞，這一種姓傳統上主要以經商為業；他的出生地毗鄰阿拉伯海的港口城市波爾班達，是一個漁民和海上商人的世界，居民多操古吉拉特語。在與虔誠信教的母親的親密相處中，童年甘地熟悉了素食、潔淨、不殺生等價值觀，並對護理他人這種母性行為抱有特別的熱情。

隨着年齡、能力的稍長，以前作為成長搖籃的家庭，會被人感覺充滿束縛，青春叛逆期也就成為主動尋求認同的嘗試時期。少年甘地曾結交了一位穆斯林小夥伴，在他的慫恿下，甘地嘗試了一系列最終未果的「不軌行為」：想要抽煙，認為父母不讓抽煙就是缺少自由，缺少自由還不如去死，因而與夥伴相約自殺；想要吃肉，認為英國人就是由於吃肉而身體強壯，但吃肉是家庭飲食的禁忌，心裏便盼着父母早死自己就可以公開吃肉；為了證明男子漢氣概而去妓院，結果被失去耐心的妓女趕了出去。這些想法和行為被稱作甘地的「反面認同」(negative identity)，也即他本人試圖隔離與克服，同時又是自身一部分的東西(頁103)。

在《甘地的真理》中，埃里克森回溯甘地的成長過程以及他的真理觀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在對甘地之所以成為甘地的分析中，埃里克森運用了他所創立的「認同說」。

《甘地的真理》中敘述甘地從留學到去南非的一章題目為「從誓言到天職」，恰好表明了成功的認同奮鬥過程的特點：從被動約束到主動選擇再到自主創造，從而找到自我，實現自立。

認同危機以及相應的認同奮鬥於青年時期最為明顯，用埃里克森的術語來講，這是一段重要的認同延償期(moratorium)。這一時期的青年羽翼漸豐，但還沒有被迫自食其力，他們可以體驗、冒險嘗試新的認同，當然也可維護兒童時期的某些認同因素。十八歲那年，甘地不顧本種姓長老反對堅持赴英留學，不惜他的家庭為此被本種姓除名，他在當時的反抗以及後來學成歸國後與本種姓成員不卑不亢的相處，說明這位富有勇氣的青年不願像絕大多數印度人那樣，把自己的認同輕易就「抵押」給種姓。甘地臨行前曾應母親的要求發誓不近酒肉和女色，在行程中他成功抵制了酒肉的誘惑。抵英之後，經歷了一段不違背誓言便得吃難以下咽的白水煮青菜的困境之後，甘地幸運地找到了一家素食餐館，並接觸到當地一些素食主義者及其思想，他還學會了自己去做素菜並樂在其中。另外，他在房東女兒青春活力的誘惑下表現羞澀，並在房東要撮合婚事時坦白自己已有妻室。這些行為說明，他在理智上和倫理上主動贊同了約束自己的誓言。

在常人那裏，找到一份現成的職業並安於其中，往往標誌着其認同危機的基本解決。甘地留學期間學的是法律，但他在畢業回國後並不想完全投入律師工作。因一個偶然的機緣，甘地應邀去南非幫助處理一件訴訟案件。在處理案件期間，他耳聞目睹甚至親身遭受了白人對印度人的歧視和欺凌，由此決

心在南非長期呆下去，並相信自己就是要領導本國同胞改變不可忍受的狀況的改革者。這一信念的確立，意味着甘地找到了他的核心認同——他的天職。在這一天職的召喚下，甘地在南非的二十年間領導了一系列反對種族歧視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甘地的真理》中敘述甘地從留學到去南非的一章題目為「從誓言到天職」，恰好表明了成功的認同奮鬥過程的特點：從被動約束到主動選擇再到自主創造，從而找到自我，實現自立。

埃里克森「認同說」的論述對象不僅限於個體，而且涉及集體、社會或國家。他曾精闢地講道：

認同既是「定位」在個體核心的一種過程，同時也是「定位」在他與別人共有的文化核心的一種過程，實際上，是確立這兩種認同的合一。偉大的領導者……之所以成為偉人，成為領導者，恰恰是因為他們通過一種最為個人化也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切身經歷了人民的認同鬥爭。(頁223)

甘地之成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也在於他個人的認同奮鬥與民族的認同奮鬥重合到了一起。

民族認同的維護與創新，來自經濟、政治、文化、精神四大領域。自十八世紀後期以來，英國殖民在這四個領域造成的損害，嚴重破壞了印度舊有的認同，而殖民者又疏於、不願甚至拒絕在被殖民者中培養新的認同因素，從而導

致印度整個民族處於嚴重的認同危機中。

首先，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十八世紀早期以來就在印度長期佔據實際統治地位，在它的殖民統治下，英國的機器製品潮湧而來，使得印度貿易入超、金銀外流，大量的本土工業和手工業被摧垮，其中首當其衝的是傳統紡織業。印度的紡織產品自古以來就是農業生產的重要補充，而現在手藝人不但要按要求進行生產，而且要以固定的價格將產品賣給壟斷了運銷權的東印度公司，所謂「非法」經營受到嚴厲禁止，傳統的規範人們生產關係的習慣法完全失靈，棉織工以及耕作者大量赤貧化。

埃里克森的「認同說」認為，只有當經濟和法律體系能夠保障從業者的報酬、地位和選擇時，生產優秀產品的必需技巧才能成為一個民族認同的首要來源。東印度公司的經濟掠奪無疑嚴重破壞了印度生產過程中孕育的認同因素。在政治方面需要一提的是，英國殖民統治有意保留印度封建體系的某些成份，比如當時遍布印度的七百個土邦。土邦的環境雖說有利於維持一些古老習俗的認同，但由於缺乏政治上自然的支持，這樣的認同並不能保持鮮活。

就民族認同遭受殖民統治的破壞而言，埃里克森認為，我們不但要注意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大書特書的災難和罪惡行徑，也要注意那些削弱了傳統文化與精神之彈性的悄無聲息的、經常看似仁

慈的手段，比如法律和教育措施（頁231）。

在法律方面，當英國人以自己的法律和審判方式取代了印度傳統的法律和審判方式時，他們可能以為自己在推行一項仁政，而實際上，他們是把自己的法律和語言邏輯強加給別的民族，而完全否定了別的民族的法律和法理概念。他們判定印度人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規定事實和真實的性質，不能自己審判自己。其直接造成的後果是外部強加的僵硬司法方式製造出許多訴訟，間接造成的後果是阻礙印度人形成新的認同。

在教育方面同樣如此，英國殖民者詆譏印度本土的語言、知識與學校教育，認為它們沒有價值可言，而鼓吹用英語以及英國人的趣味、觀點、道德、知識全面改造印度人。這種文化攻擊到極盛時也給印度人的認同帶來嚴重困擾。

甘地個人認同奮鬥的意義，需要放在印度民族認同危機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比如甘地從南非回國後，將他的真理學院設在阿赫梅達巴，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個古老的紡織業中心保持着較濃厚的傳統生活特色。甘地放棄了他自留學時期就養成的英國紳士的穿着方式，而採取本國的服飾，以至最終形成被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嘲諷為裸露的穿着風格(頁359)。他宣導手紡車運動，而手紡車發揮的更多是認同象徵的作用。甘地這類行為揭示的一個道理是：一個民族認同的發展，必須是在對傳統根基

埃里克森「認同說」的論述對象不僅限於個體，而且涉及集體、社會或國家。甘地之成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也在於他個人的認同奮鬥與民族的認同奮鬥重合到了一起。

用「認同」的術語表達，「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就是：在面臨全人類有一個聯合認同，但又被階級、民族、國家等等「亞種」以各自方式予以否棄的現實中，努力發展包容性的以至普世化的認同。

進行維護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可以說甘地最終為印度找到了認同，而一個民族有牢固的認同才談得上自治。

相對於人們視為熟悉的、親切的、自己的東西，必然有陌生的、古怪的、異己的東西，認同中必然包含着排斥。埃里克森以「假種」(pseudo-species) 概念刻畫這種排斥，他說「假種」之「假」有兩層含義(頁384-86)：

其一，「假」的意思是將某物喬裝成不是其本來所是的樣子，以這種「假種」的名義，人可以給自己和自己的世界賦予工具和武器、角色和規則，賦予傳說、神話和儀式，這樣就可以把自己這一群團結在一起，並在其中激發忠誠、詩意、英雄主義這類超個人的意義。這種自然發展的認同已經埋伏着危險的成份，因為其中的自我理想化會誘使人為了自己的優越身份或榮耀而戰。

其二，是指某人盡力用宣傳中半真半假的內容來愚弄別人，也愚弄自己——納粹德國宣揚日爾曼人種優越論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埃里克森強調人類集體認同中後一種「假」的方面在某些形勢下會佔據上風，使得某一群體的自我理想化變得更加排外；並且在這種「假種」形成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一種驚人的事實，即某一個「種」如果被另一個所統治，它就很容易把佔統治地位的「種」的嘲弄性看法吸收進它的自我評價中。這一弱勢的「種」在多數時候表現得曲意服從，在時機來臨時則會大肆破壞。不過，人

們的「假種」心態及其可能惡果，可以由發展更具包容性的認同來解除或避免。這種更具包容性的認同，有助於克服經濟恐慌，克服對文化變動的焦慮和對精神真空的擔憂。

甘地所宣導與實踐的「非暴力抵抗」，可以從發展更具包容性的認同乃至普世認同這一角度進行認識。在南非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中，甘地逐步發展出他的「非暴力抵抗」理念。「非暴力抵抗」常常被人們誤解作(而實際上並非)弱者的武器，埃里克森使用的英文表達“militant nonviolence”恰當地表明了這一點，即這種非暴力是戰士的非暴力，非暴力抵抗者是進行非暴力抵抗的勇士。但既為勇士，卻又要堅持非暴力原則，原因在於甘地主張的實質是鬥爭雙方應該認識到他們分享同一個包容性的認同。在阿赫梅達巴紡織工人的罷工中，甘地力促鬥爭中的工人認識到他們與資方在經濟力量和尊嚴方面是對等的，雙方終究是相互依存的，也即分享同一個包容性的認同。

「非暴力抵抗」主張：對正義的要求，不能以妖魔化對方、損害甚至殺掉對方等不義手段來達到；人類只能通過非暴力來克服暴力，通過愛來克服恨；成功的鬥爭是對雙方都有精神上的提升的鬥爭。用「認同」的術語表達，「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就是：在面臨全人類有一個聯合認同，但又被階級、民族、國家等等「亞種」以各自方式予以否棄的現實中，努力發展包容性的以至普世化的認同。